儒学的六经、诸子与传记

朱 汉 民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长沙 410082)

摘　要：在儒学体系中,六经的思想与诸子的思想有很大差别。儒家学者尝试通过“传记之学”,将“经”“子”两种不同学术形态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思想整体。儒学因此既能够保留深厚的文化传统意识,又具有开拓的思想创新精神。在儒家思想的整合过程中,“经”“传”“子”的文献形态在不断发生变化。

关键词：传记之学;六经;诸子;儒学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5-0026-09

儒家是以上古三代的文献档案为其建构知识、创造思想、形成学派的依据,故而是“六经之学”的创建者、确立者;但是,儒家也是“六经以外立说者”,故而儒家又是先秦诸子之学的开拓者,并成为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可以说,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从知识形式来看,儒家的经学和子学是有很大差别的。

但是,儒学必须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思想体系,故而儒家必须将经学和子学整合起来的。儒家学者早就发明了一种将经学和子学结合起来的学术形态,就是“传记之学”。儒家学者通过“传记之学”,将“经”“子”两种学术形态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探讨儒学“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的内在联系,能够使我们理解儒学为什么既保留了深厚的文化传统意识,又具有思想创新精神。

一、儒家的历史意识和现实关怀

夏商周是中华文明的孕育时代,三代时期形成的思想学术对后来的中华文化演变、发展均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那个时期文化知识的主体是由皇室贵族垄断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产生了脱离皇室贵族垄断的诸子百家之学。自汉代以来,学术界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观点:诸子百家之学出于西周王官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转引刘歆《七略》提出了诸子百家可能是来源于周朝官守的学问,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均与西周王官之学有知识学问上的渊源关系。西周时期官师合一,不同职官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不同职官之学下移到民间就形成了不同学术主张的诸子之学。

但是,近代以来,这一观点受到了挑战。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诸子学来源西周王官之学提出怀疑。特别是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由章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和“九流皆出王官”说,进一步上溯到刘歆《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针锋相对地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他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是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政治、社会问题,已经脱离贵族统治集团士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而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就形成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的不同学派。他说:

> 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诸子既群起,乃交相为影响,虽明相攻击,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击者之薰化。……故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

收稿日期:2016－06－08
作者简介:朱汉民,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的重建和整合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5 AZD032)。

> 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①

胡适的观点影响很大,成为近代以来有关先秦诸子起源的一个代表性的学术主张。

其实,当我们考察诸子起源问题时,会发现近代以来学界将诸子起源简单归结为“诸子出于王官之学”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并不合适的。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谈到各家著述后,提出这些学派可能源于周朝官守。但是,《汉书·艺文志》在论述诸子可能出于王官的同时,又提出诸子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政治背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②可见,《汉书·艺文志》也并没有将诸子学的起源完全归结为王官之学,诸子学的起源确实还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现实社会问题相关。也就是说,王官之学只是为诸子学提供了学术文化资源,但是诸子学所欲解决的问题还是来自现实的社会政治。

所以说,从学术资源、文化背景来考察诸子之学,春秋战国的诸子之学确实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兴起不是凭空而起的,夏商周时期所创造的精英化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均集中和体现为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就是这些王官之学及其思想文化的掌握者。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不同学派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渊源,离不开王官之学的学术文化母体。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之学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些依据的。但是另一方面,从诸子之学所欲解决的问题意识、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焦点来考察诸子之学,可以发现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均是与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动荡、社会失范、诸侯争霸的现实关怀有关,诸子之学提出的思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亦可以说“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而这一个视角特别能够说明儒家的起源。强调“诸子之学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诸子之学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的渊源;强调“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诸子之学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的关切和政治功利的追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之学形成,是离不开这两个方面的考察和探寻,这也是先秦儒家及其诸子之学不同于古希腊思想家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以发现,在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将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结合得最好的,其实正是儒学。儒学既是西周时期的王官之学,因为儒学推崇的“六艺之学”,其实就是源于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儒学又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因为儒学本来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实就是儒家子学。将儒家的六艺之学与诸子之学结合起来,才构成完整的儒学。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发现儒学之所以能够在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是最为重视对夏商周的文明体系继承的学派,他们自称“述而不作”,通过“六艺之学”的整理、传播,继承了三代时期的优秀华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儒学又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非常务实的政治功利追求,他们希望通过切近的血缘观念、家族伦理来建立维护社会关系、国家秩序、天下安泰的价值体系、文化理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派比较,儒家学派是对文化传统继承最多、对政治现实关怀最切的学派。

由此可见,儒家的“经”与“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从文化的渊源与地位来说,“经”是文化根本,“子”不过是文化枝叶,因为儒家文化是从三代文明孕育出来的;但是,从思想创新与建构来说,“子”是思想主体,而“经”则不过是思想资源,“经”的思想是儒家建构起来的。和其他诸子学派比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决了历史文化传承和时代思想创新的结合。以这个观点来考察儒学,可以找到儒学能够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在儒家的学术体系中,经学主要表达儒家对三代文明体系与思想传统的继承,子学则主要表

---

① 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第二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85 页。

②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46 页。

达儒家因社会政治关切而追求思想创新。但是,儒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整体,必须要在学术上将经学和子学统一起来,在思想上将“王官之学”与“士人之学”统一起来,在政治上将三代先王的天下之治与春秋战国士人的天下之道结合起来。因此,儒学在建构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时候,需要同时考虑传统意识和现实关怀的问题,故而面临如何将经典的思想继承与子学的思想创新结合起来的问题。

二、传记之学:整合六艺与诸子

儒家是如何将经学的思想继承与子学的思想创新结合起来?儒家学者创造性地利用了“传”“记”等经典诠释的学术形态。虽然说,“六经”在儒学体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是经典的丰富意义、深刻内涵,却需要以后的儒者对“经文”的不断诠释才能够彰显出来。作为“先王之政典”的“六经”,如果没有“师儒讲习为传”的“传记之学”,经文中的“常道”“常典”“常法”就只是一种潜在的意义,那么,这些三代文献就不可能成为中华经典。在两千多年的经学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解释经文的文献,这些文献往往是以不同体例出现,包括传、记、章句、注、解、诂、训、集解、义疏、讲义等等。在经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均有经学家们创造出一些新的经解体例,以表达他们对“经”的理解和解释。尽管儒家学派是吸收三代文明的乳汁而成长起来的,是三代文明孕育了儒家学派;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儒家学派是三代文明的开拓者,没有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对三代历史文献的整理和诠释,三代留下的文献档案就不可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经典。孔子及其儒家不仅整理、建立《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经典体系,他们还通过“传”“记”“序”等体例,阐发了能够指导后世的“常道”“常典”“常法”,最终使六经获得了垂教万世的意义。

什么是“传”?《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先秦儒家诠解、传授经典的主要体例是“传”“记”之学,其目的是“以传示后人”“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儒家诸子通过“传”的形式,不仅是将三代先王留下来的历史文献、王室档案保存下来,而且将其中的政治智慧、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社会礼仪等思想传示后人。所以儒家经学不仅包括原来属于三代王官典藏的经文,同时还包括春秋战国以来儒家诸子对经文的诠解。正因为儒家通过一系列传记之学而展开经典诠释,才可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经学。这种经、传一体的经学体系的成型,才真正完成了儒教文明的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的建构。

可见,“经”离不开“传”,“传”的出现才真正确立了经学的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但是,“传”的思想和学术又离不开“子”,正是“子”的现实关怀和思想创新,才使得儒家之“传”具有建构新的价值系统、知识体系的能力。儒家学者总是在“转受经旨,以授于后”的同时,将子学的社会关切和思想创新融入对经学的诠释和传授中去。可见,传记之学的学术形态出现,既标志着经学的成型,也体现了子学的成熟,更是实现了“经”的文化传承与“子”的思想创新的结合。

所以,如果我们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传记之学与儒家经典建构、儒家子学思想的形成,几乎是一个同时态的历史建构过程。

孔子就是在整理三代文献、建立仁学思想的同时,开始了儒学传记之学的建构。史家大多认同,孔子不仅是儒家文献的“经”的确立者、“子”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传”的开创者,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典籍的“经”“子”“传”,其实均开拓于孔子。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对孔子创“传记之学”作了充分肯定。他说:

>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①

司马迁指出,孔子创立的虽然是私学,但是他仍然是以原本是属于王官之学的《诗》《书》《礼》《乐》教育弟子,《诗》《书》《礼》《乐》经过他的整理后成为经典,他在从事经典教育的时候,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经典的理解,故而有《书传》《礼记》等传记之学的出现。

---

①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2332 页。

为什么现代学者看不到孔子《书传》《礼记》等传记之学的原始古本？其实,孔子的讲学、传经主要是口讲言传,由弟子记录下来而成为“语”“言”“传”“记”。应该说,记载孔子口讲言传的子学著作《论语》类文献,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形成过程,开始是由学生记录孔子私人讲学的语录,后来经历了战国、秦汉才能够最终成型。孔子开拓的《六经》传记之学,同样是经历了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之际才最终成型。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中曾经论述说:“孔子既没而微言绝,七十二弟子终而大义乖。”到了战国时代,儒门诸弟子手中主要有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包括经传类、子语类的各种讲学记录,这些亦可以看作是儒家经学和子学的原始底本或古本,但还不是后来在西汉初年成型的经学和子学的典籍。关于这一点,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中作了进一步解释:“六国之世,儒道分散,游说之士各以巧意而为枝叶,孟轲、孙卿守其所习。当秦昭王时,孙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孙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①战国时期的荀子手中的“儒术”,其实就是“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的讲学记录,即所谓“孔子之语”“七十二弟子之言”的讲学、传经,并由他们的弟子记录下来,而成为“语”“言”“传”“记”类的“凡百余篇”的文献。应该说,它们仍然还只是秦汉之际成型的《论语》类和经传类的原始古本之一。这是因为,孔子之后,儒家后学一直在继承孔子的合经文、传记、诸子为一体的儒学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

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早期儒家的经书、传记、诸子类的典籍均遭到严重破坏。但是,西汉初逐渐恢复的儒家经书、传记、诸子各类典籍,加上郭店战国楚简、上博战国楚简等出土文献的不断被发现,当代学者仍然能够看到早期儒学的文献体系和儒学思想学术的大体建构过程。这一个时期修订完成的儒家经典传记之学,包括《周易传》《尚书大传》《大戴礼记》《礼记》《韩诗外传》《春秋三传》。这些传记之学的典籍与经文联系紧密,它们主要是诠解六经经文的讲学记录和文章,后来成为经典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现存的“五经”的传记之学中,包括下列的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一,保留有大量孔子讲学的记录和传经的遗文。在现存的《尚书大传》《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等代表性传记之学中,保留了大量孔子讲学的记录,这些讲学记录表达了孔子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的个人见解,其实就是《论语》类文献,亦可以看作是孔子的子学文献。当然,这些讲学记录也包括孔子诠解六经经文的内容,故而一部分亦可以看作是经典传记的文献。另外如《易传》的十篇传文,司马迁认为均是孔子所作。虽然自从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提出疑问后,学界不再将《易传》作者完全归为孔子,但是,当代学界仍然比较普遍地肯定《易传》是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传世的《易传》中保留有大量孔子讲学的记录和传经的遗文,正体现了孔子及其弟子们不断思考、修订、完善儒家传记之学的历史建构过程。

其二,保留有许多孔门七十二子的讲学的记录和传经的遗文。孔子逝世后,孔门七十二子继续讲学、传经,亦留下了许多讲学的记录和传经的遗文。在《周易传》《尚书大传》《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春秋三传》中,除了一部分孔子本人的言论和著作的文献外,其他大量文献则是孔门弟子及其后学的言论和著作。司马迁说“《书传》《礼记》自孔氏”确是事实,现存的《尚书大传》《礼记》等经传确实保留了少部分孔子传经的内容,而其他大量文献则是孔门弟子的子学著作。现代学者均肯定,《小戴礼记》之《缁衣》《中庸》《坊记》《表记》等被认定为出于《子思子》,《小戴礼记》之《乐记》出于《公孙尼子》,《小戴礼记》之《大学》《曾子问》出于《曾子》。这些著作既可以看作是孔门弟子及其后学的子学文献,也可以看作是他们留下的经传文献,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家子学与经传的密切联系。

其三,是秦汉以来那些最后成书的儒家学者讲学和传经的言论。现存的“六经”传记之学的

① 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杨朝明等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 2009 年版,第 578 页。

成型,基本上是在汉代。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儒学文献也日益受到重视,汉儒大量收集、整理孔子以来的各类文献,编成了儒学的经学、子学文献,其中的经学文献就包括了经文和传记。但是,汉儒在编辑这些不同文体的儒家文献时,也加进了自己的一些著作,其中一些著作还托名孔子及其门人。这样,在“六经”的传记中,其实还有相当一部分汉儒的文献。

通过对上述《周易传》《尚书大传》《大戴礼记》《礼记》《韩诗外传》《春秋三传》等传记之学的分析,我们看到,孔子及其儒家后学一直在做合经文、传记、诸子为一体的儒学思想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在这个儒家文献的建构过程中,传记之学其实就是一种连接三代经典和春秋战国子书的重要典籍。一方面,这些传记之学的典籍原本主要是孔子及其弟子们的个人讲学记录,这些个人讲学表达了儒家学者对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的个人见解,就其思想内容来说大多可以归类于子学文献。另一方面,这些传记之学的典籍从形式上又依附于经,作为与经典连为一体的文献,传记之学承担着解释经典、传播经典的重大使命,三代原典的本来意义、思想内涵,均是由这些传记之学来规定的。这样,我们看到的“经”与“子”的重要区别,“王官之学”与“士人之学”重要区别,先王的天下之治与士人的天下之道的重要区别,均被传记之学消解了。有了这些传记,人们不容易在儒学文献典籍中发现这一些重要区别。不仅是古代人不容易看到这些区别,现代学者也不容易发现它们的重要区别。

另外,对于儒家学者来说,他们通过传记之学诠释经典,实现了文化传承和思想创新的结合。那些直接诠解六经经文的传、记、序的文体,包括《易传》《书传》《礼记》的一部分、《乐记》《诗序》《春秋传》等,它们作为传记的主要文化使命就是诠解经文、转受经旨。而经过他们诠释的原典,其思想内容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易传》《书传》《礼记》《乐记》《诗序》《春秋传》等传记之学,一方面表达儒家鲜明的文明传承意识,他们希望上承三代先王的政治经验、道德理念、礼乐制度,使华夏文明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充分表达春秋战国儒家诸子的非常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他们希望建立一套既合乎理想又非常务实的“天下有道”的人文世界。也就是说,这些直接诠解六经经文的传、记、序的文体,完成了一种将子学的思想创造与经学的文化传承结合起来的追求。

三、由诸子转化为传记

儒学体系的“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一方面,“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的差别是严格的,因为三种学术形态产生的时代不同,“经”的制作于尧舜和夏商周三代,“传”“子”制作于春秋战国以后的时代;同时,三种学术形态的制作主体也不同,“经”的制作主体是“先王”“圣王”,“传”“子”的制作主体是“儒者”“儒士”。后来的许多学者一直强调,“经”“传”“子”的这一差别是必须严格遵循而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另一方面,儒家“经”“传”“子”的分别又不太严格,譬如,一些由“儒师”“学士”的讲学记录、撰述著作,最初归为“子学”范围,但是以后其文献类型又转变为“传”“记”,其中一些还可能转变为“经”。

应该说,儒家经、传、子的分别不太严格,是由儒家经学建构的方式和特点决定的。儒家“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的明确划分和不断转换,涉及中国经学史演变的历史进程、学术理路、思想演变等重要问题。儒家学者往往是通过“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以不断地诠释、建构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他们总是通过经学的不断建构来解决文明继承和现实关怀的结合。所以,探讨儒学体系中的“经”“传”“子”的演变规律,可以深入把握儒家经典体系变化的学术理路,还可以进一步对中国思想史、中华文明史的种种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这里,我们首先简要探讨,儒家子学如何转化为传记之学的?

如果我们以“六艺之学”的学术形态理解儒学的话,应该说儒学的“传记”“诸子”的形成,其实均与经学建构有密切关系。儒家学者通过整理三代文献档案而建立起“经”的体系,他们还必须通过“传”来阐发经义。儒家的“传记”之学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思想创新的结合,这些“传记之学”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则是源于“传记之学”与“子学”的内在联系。

我们认为,儒家传记之学与子学有三种类型的思想与学术的联系:其一,子学文献整体作为经典的传记;其二,子学文献部分篇章转化为经典的“传”或“记”;其三,以子学的思想融入传记之学来解释经典。

首先,讨论子学文献整体作为经典的传记。儒家子学文献通常是指那些由儒家诸子通过讲学、议论、答问的形式表达作者个人的观点、并且最后由学者个人编纂的书,这些书包括《论语》《曾子》《子思子》《孟子》等,这些文献最初往往列为子学的文体。但是,儒家诸子本来就是以三代先王的经文为思想依据的,同时他们的个人讲学有不少诠解“六经”经文的内容,这样,尽管他们是以个人讲学的形式留下了子学著作,但是这一些著作仍然具有“转受经旨,以授于后”的功能,体现出尊经、解经的学术传统。尽管这些著作本来是子学文献,后来的儒家为了提升这些子学著作的地位,也将其中一部分文献归类于传记之学。

子学转化为传记之学在儒学中比较普遍,从孔子留下的讲学记录《论语》开始,到孔门七十子的不同子学著作,诸如《子思》《曾子》《漆雕子》《公孙尼子》《孟子》《荀子》等等,这些都属于儒家子学著作,因为它们均是儒者私人讲学、论学的记录,由其弟子编辑成书,故而这些著作均以子学名书。作为子学著作,这些典籍的内容和形式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而系统地表达儒者个人对文化建设、国家治理、天下统一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并且希望通过指导君主、培养士人而实现这些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儒家诸子在讲述自己思想的过程中,又特别注重吸收传统文化资源,他们不仅明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传承三代先王的遗言,并且在讲学中大量传述三代原典的经文,这一类文献在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传记之学,其实就在于它们能够将子学的思想创造与经典的文化传承结合起来。

儒家子学文献整体转化为传述经典的传记之学,往往直接以某一些儒家子学著作为经典的“传”。譬如,《论语》本身完全是一部子学著作,其内容、形式均具有子学著作在特点,在许多诸子学研究著作中,《论语》均被认为是子学的开端。① 但是,在最早的文献分类中如《汉书·艺文志》中,《论语》并没有被列入的“诸子”中,而是被当成儒家经典的传记。故而汉代就有“经莫大于《易》”“传莫大于《论语》”②的说法。《论语》的编撰过程,就是一个由子学著作而演变为传记之学的过程。《孟子》也属子书,但是它在汉代的地位逐渐高于一般的儒家子书,获得了传记的地位。据汉赵岐《孟子题辞》所说:“孝文王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迄今诸经通义,得引《孟子》以明事,谓之博文。”③可见,孝文帝时《孟子》作为传记之学已经与《论语》《孝经》《尔雅》一道置博士。后来汉武帝罢传记博士,《孟子》始不立学。汉代学者讲学,往往征引《孟子》之言以阐明“诸经通义”。这些均证明,《孟子》在汉代一度成为由子学著作转变为传记之学的著作。

其次,讨论子学文献部分篇章转化为经典的“传”或“记”。这一点以《礼记》最为突出。《礼记》是一部先秦到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汇编。作为《礼》经的传记之学,其内容包括对《仪礼》所进行的思想诠释,大多是对礼学所进行的通论,这也是《礼记》一书的精义之所在。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时将《礼记》列入经书之中,取代了《仪礼》自战国以来在儒家经典中不祧之祖的地位。虽然后来《仪礼》和《周礼》仍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学者们还是以《仪礼》为经,但是《礼记》在儒家经典中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改变。《礼记》的书名就是阐述《礼》的意义、精神的传记之学的著作。近几十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礼记》的来源问题变得愈来愈清晰。结合出土文献和传统文献的记载,《礼记》的来源有三:一

① 蒋伯潜:《诸子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出版,第 225 页。
② 《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第十一册,第 3583 页。
③ 《孟子注疏题辞解》,《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第十一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 页。

是诸子之说;二是先秦到秦汉时期礼学家的“记”文;三是《礼古经》。先秦时期,礼学家们编写的“记”,重点是为了对《仪礼》进行意义的诠释。这些“记”,在先秦时期是很多的,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累世相传。郭店竹简和上博竹简中关于《礼记》这类文献正是这些以单篇形式流传的“记”文。班固云:“‘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①“七十子后学”的时间跨度很大,班固虽然未能明确指出各篇的撰者,《礼记》选编的材料中很大一部分为先秦诸子之文,如《礼记》的《坊记》《中庸》《表记》《缁衣》等选自《子思子》,《大戴礼记》的《曾子立事》等十篇选自《曾子》。

其三,以子学的思想融入传记之学来解释经典。儒家传记之学与子学的渊源关系,还有一种就是以子学的思想融入传记之学来解释经典。儒家的传记之学中,大量是直接为诠释经典而作,其知识旨趣似乎在历史文献而不是现实社会,故而这些传记之学往往与作为三代文献的六经经文密切相关。但是,这一些直接为诠释经典而作的传记,其思想观念、人文关怀均是源于儒家诸子的思想,体现出儒者对文化建设、国家治理、天下统一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念。譬如《礼记》,其精义在于阐释礼义,《礼记》的很多篇目是对《仪礼》所进行的阐释,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等篇分别是对《仪礼》的《冠礼》《昏礼》《乡饮酒礼》《射礼》所记载的礼仪进行的阐释与发挥,从中探寻古人行冠、婚、乡、射诸礼的深义。《仪礼》重在记录礼仪,《礼记》重在阐释礼义,二者互相发明。《礼记》所阐释的礼义来源于哪里呢?在孔子及其七十二子的诸子文献中,我们看到儒家诸子通过讲学、议论、答问的形式,表达儒者个人对礼义的观点。他们针对现实社会的“礼崩乐坏”,主张恢复、重建礼乐文明。但是,他们思考礼乐的依据,却从巫术、鬼神转化为人情、人伦、天道。在《论语》《子思》《曾子》《孟子》《荀子》的儒家诸子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及其儒门后学在系统地探讨礼乐的意义。他们分别从人的情感表达、社会秩序的维护、宇宙天道的必然,论述了礼乐文明的价值、意义和必然性。我们可以看到,《礼记》所阐释礼义,和儒家诸子一脉相承,由此可见,传记之学与儒家诸子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儒家子学的思想可以广泛地融入解释经典的传记之学中。

四、由传记转化为经典

现在,我们进一步探讨,儒家传记又是如何转化为经典的。

“经”本来是代表中华核心价值的权威典籍。由于中华文明是一种延续时间长而一直没有中断的文明,其核心价值体系也是处在一个不断地丰富、发展、完善的过程中,故而,中华经典体系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中国学术史上出现过“六经”“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和“四书”的不同经典体系,儒家士大夫通过不断地回归经典、重建经学,以实现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一方面,上古时代中华先民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民族性格等各种文化基因,往往通过儒家经典文本而固定保存,并不断传播开来;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和变革,中华文化的知识、价值和信仰也需要不断地发展、演变和变革,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也是通过士大夫不断地重新诠释经典、重建经学来完成的。所以,从儒学的起源来说,儒学的“经”“传”“子”三种学术形态有明确的思想特点和文化功能。但是,从儒学的流变来说,“经”“传”“子”的具体文体却经常发生转换,“子”转换为“传”,“传”又可以转换为“经”。作为儒学经典的“经”,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系统。

“传”为什么可以转化为“经”?其实这也是由经学体系形成阶段“传记之学”的性质、特点、地位所决定的。早期儒家在建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经典体系时,同时建构了包括《易传》《书传》《礼记》《诗传》《春秋传》之类的经典传记之学。这些传记本来就是与经文紧密联系而一体不分的,对经文包含的核心价值、思想内涵的理解,必须依赖于传记文本。这样,传记不仅仅是经学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更加重要的部分。

①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第六册,第 1709 页。

在经典体系的价值建构、思想建构中，传记之学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譬如，“群经之首”的《周易》是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构成的，即由卦爻象、辞而成的《易经》与由“十翼”而成的《易传》共同构成的《周易》。《易传》通过对《易经》的创造性诠释，使这部原来是以卜筮记录为主的巫术记录发展为解释天地万物的义理学著作。从表面上看，《易经》具有崇高的文化地位，因为八卦、六十四卦、卦辞、爻辞这些文本要素经过了上古以来的代代圣人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文王、周公的制作完成的，而儒家学者的《易传》则只是为了上达古圣人之意而对《易经》作出解释而已，故而是传依托经，传的思想文化意义来源于经；但从实际上看，正由于有《易传》的解释发挥，使原来只是作为卜筮之用的占卜符号、记录获得了思想文化层次的全面提升，“经”的思想文化意义又依赖于“传”。不仅仅是《周易》，其他的《诗》《书》《礼》《乐》《春秋》的经典也是如此，这些经文经过儒家学者的“传”“记”“序”的诠释，而阐发了能够指导后世的“常道”“常典”“常法”，使经文获得了垂教万世的意义。故而，“经”的思想文化意义的拓展依赖于“传”。这正是中国古代经典形成和诠释的重要思想文化特色，后来的诠释者不仅仅是丰富了原典的意义与文化内涵，甚至可以说，当后来的诠释者将原典纳入到一个全新的文化视域、观念体系、思想层面时，其实是在重建一种新的思想文化。

因此，西汉确立的政治化、制度化的经学，其实同时将传记之学提升到了经典的地位。在西汉的五经系统及其官学体制中，五经的经、传是一体的。这个时候，“传”与“经”一体而获得与“经”相同的地位。随着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发展，许多原本是传记之学的典籍，逐步独立为经典。最早由传升经的是《论语》《孝经》。《论语》本来是孔门弟子整理出来的孔子私人讲学的记录，在后来的儒学史上，它又被认为是传三代先王文献典章的“大传”，特别是孔子被汉儒确立为“圣人”，故而《论语》在西汉时期就逐渐成为经典，成为“七经”之一，与三代文献的《诗》《书》《礼》《易》《春秋》并列为经。《孝经》在汉代被认为是孔子为曾子陈孝道的著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以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汉书·艺文志》也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所以，《孝经》与《论语》一样，在西汉时期就逐渐成为“七经”之一的经典。

在经典的演化过程中，一些本来是为经文而撰写、但是其本身又有一定相对独立性的传记文献，逐步转化、提升为独立经典，与原来的“五经”并列。唐朝时列《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均是以传为经的例子。这六部经、传并列的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均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唐文宗时期，再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就是“十二经”。到了宋代，《孟子》的地位不断提高，故而又增加了《孟子》，总共十三种儒家文献，共同取得“经”的地位，合称“十三经”。由于“十三经”整合了从汉至宋的长期经典体系的演变和发展，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故而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经典体系，一直延续到清代。清代《十三经注疏》成为经学体系的标准范本。儒家经典体系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而终于定型，在儒家经典体系不断扩充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儒家经典的拓展，其实就是不断地将儒家的传记之学提升为“经”的过程。一些原本是“传”的文献获得了“经”的地位。

尤其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宋代“四书”的出现，标志着儒家经典体系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十三经”是一个经、传一体的经典体系，而“四书”则完全是一个以传记之学取代“五经”的经典体系，体现了中国经典体系的重大变化。北宋中期，《论语》地位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孟子》地位的升格，加之宋儒对《大学》《中庸》的重新认识与选择，《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四部书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成为宋代儒家学者抵御释老、复兴儒学、建构新儒学体系的最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各派思想家都曾对这一学术资源进行了充分挖掘。不同思想倾向的儒家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所进行的阐释，推动了“四书”学形成和发展。南宋时期，“四书”学继续繁盛、发展，并且逐渐代替“五经”成为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宋代“四书”学的定型，与著名儒家学者朱熹的贡献分不开。朱熹认为“四

书”代表了儒家的道统,包含了天地万物之理。他说:“《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①“《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②“《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③可见,朱熹不仅是重视“四书”,而且认为其重要性要超过“五经”。这里,体现了一个重大的学术史、思想史的转变:初看起来,这是传记之学的重要性超过经典本身,其实却应该说,是儒家士人的子学著作的重要性要超过三代先王的经典文本!

Six Classics, Pre-Qin Scholars and Commentary Learning of Confucianism

Zhu Hanmin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There were great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ix Classics and the Pre-Qin scholars in the system of Confucianism. Confucian scholars made an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 two different academic forms — classics and commentaries — into an organic ideological system. So Confucianism could not only retain the profound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tradition, but also keep with the pioneering spirit of innovative thought.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constant changes took place in the literary form of classics, and in the commentaries of scholars.

Key words: commentary learning; Six Classics; Pre-Qin scholars; Confucianism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朱子语类》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49 页。

② 《朱子语类》卷十九,第 429 页。

③ 《朱子语类》卷一○四,第 2614 页。